

民族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史。胡铁球、左理《契丹的兴起与部落组织的有序化及农业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部落组织是否有序和农业的发展程度是制约契丹族发展壮大两个重要因素。董万苓《完颜女真发祥黑龙江说应当重新认识》(《北方文物》第2期)提出不同结论:(1)完颜女真主体发祥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咸兴平原,形成于牡丹江上游;(2)始祖函普“从高丽来”确有其事,但不是高丽人而是长白山“三十姓”女真人;(3)完颜女真是多元构成,主体却是长白山女真人;(4)曷懒甸人与完颜女真存在族源关系,都出自长白山女真;(5)传至九世穆宗盈歌、十世康宗乌雅束为都勃极烈时率部经营曷懒甸,是函普后人为了凝聚血族、扩大兵源而采取的重返祖宗发祥故土的战略决策,这为阿骨打统一诸部、建立金国奠定了基础。彭向前《试论辽对西夏的遏制政策》(《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指出辽朝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夏政策,辽控制西夏的目的在于利用西夏在宋境西部造成的紧张局势,向宋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他在《试论辽圣宗遣军远征甘州回鹘的战略意图》(《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中认为“远征”并非配合西夏作战,而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发动对周邻各族战争的一部分,是辽与宋竞争构建国际秩序的继续。汤开建《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三份重要文献》(《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介绍了以往宋夏关系史研究中鲜为人注意的《绥州城录》、《永洛故城》、《钟太尉传》三份重要文献。此外有郑川水《辽圣宗及辽与高丽藩交考略》(《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陶玉坤、薄音湖《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王天顺《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述论》(《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杨浣、陆宁《略论唐宋党项政策与西北民族格局的互动》(《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胡玉冰《浅述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陈国光《西辽统治者与西域地方伊斯兰政权》(《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黄震云《契丹的由来和辽代的建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1、2期),任崇岳《西夏遗民何处寻》(《寻根》第5期),杨富学《〈述善集〉与西夏遗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胡保峰《略论金都南迁后金朝形势与宋金关系》(《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等。

## 20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评述

于运全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沿海分布着7000多个大小岛屿。沿海人民“以海为田”,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同时也承受着海洋灾害的侵袭。我国又是一个灾害多发性的国度,历史时期中国海洋灾害主要表现为风暴潮、海啸、巨浪、海冰、海雾、海岸侵蚀、海难等。频繁的海洋灾害给海洋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也危害着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大量的官私文献中,存留有许多灾害史料,其中也不乏海洋灾害史料。丰富的史料为海洋灾害史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就中国海洋灾害史的研究现状来说,情形却不容乐观。当前,中国海洋灾害史的研究无论是在海洋史学或灾害史学的建设中,都是十分薄弱的一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海洋灾害史研究成果更是寥若晨星,在当前海洋灾害史研究中唱主角的大多是海洋学界或科技史学界的学者,这也使得海洋灾害史研究成了海洋学研究或灾害学研究的附庸。本文在充分发掘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运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学界零星、分散成果的总结,梳理出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的概貌,希望能有助于看清前行的方向,以利于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回顾 20 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的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和阶段。

### 一、海洋灾害史料的整理

中国海洋灾害的史料广泛分布于正史、沿海地方志、各类档案、笔记小说及碑刻、沉船等文献或实物资料中。因而,海洋灾害史料的整理是一浩繁的过程。1978 年印行的《中国古代潮汐资料汇编·潮灾》(中国古代潮汐史料整理研究组编,以下简称《潮灾》)油印稿,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海潮灾害史料,此稿分地区并按时间顺序分列了中国沿海的潮汐灾害史料,该资料虽总体上较为简略,但有些材料属实地调查所得,弥足珍贵。陆人骥编著的《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 年),在《潮灾》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浙江及苏南的方志材料,还收入了如《钦州地区历史自然灾害文献记载摘编及台风暴潮实地调查记录》中的潮灾史料及调查材料。该书按时间顺序,将同一地区的史料编排在一起,不同文献的记录附于其后,以资比较。作者还对部分史料进行了考证和辨误。长期以来,此书为海洋灾害研究者广为引用。但其不足之处是有些地区的资料相对较弱,如福建地区基本上以《福建省历史上的海潮灾害记录表》为蓝本加以拓展,不甚全面,如果对照《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则会发现,广东海区(包括海南及广西沿海)有些海潮灾害史料多有遗漏。此外,晚清民国部分较为粗略,大量的报刊杂志、档案材料没能收入。宋正海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年),其“海洋表”是在《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简编,增加了些笔记小说中的材料,以时间为序列出,有利于统计分析,但仍然不够全面。宋正海等主编《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异常年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的海洋灾害部分是以上书为蓝本,择其要者列出。

此外,沿海各省也整理了辖区内的海洋灾害史料:如 1961 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3 年、1999 年两次增订,加入广西苍梧、容县及香港、澳门的材料,广东科技出版社),其中水灾纪录和风灾纪录中收有广东、广西、海南的潮灾及台风史料。1964 年,福建潮汐资料编写组的《福建潮汐资料汇编》中附有《福建省历史上的海潮灾害记录表》。1967 年,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水利局编《江苏省近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江苏沿海沿江地区的潮灾情况。1978 至 1980 年,赵传集主编《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山东农业科学院),其第三分册收录了山东省风暴潮灾害史料。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浙江灾异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也有风暴潮灾的记述。火恩杰、刘昌森编《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料汇编(751—1949)》(地震出版社,2002 年),其第一章“风暴潮”有关清后期材料较为详细,收集了

《申报》等报刊材料。第三章“风灾”还集有台风、龙卷风等灾项。

在入海河流的灾害史研究中,也有涉及海洋灾害研究的,如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编《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气象出版社,1985年)、水利部治淮委员会编写组的《淮河水利简史》(水利水电出版社,1990年)。其中尤应称道的是,20世纪80年代起,水力水电科学研究院主编的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3年)、《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浙闽台地区诸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8年)。该丛书将海潮灾害的相关档案材料特别标出,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详细、便利的档案史料。

## 二、灾害学本位的海洋灾害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海洋灾害史料整理工作的陆续完成,加之“国际减灾十年(1990—2000)”计划的启动,海洋灾害的研究得到国家和学界的重视。

虽然在海洋灾害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有历史学者的参与,但就海洋灾害研究的总体而言,诸多领域均是自然科学学者们开拓并唱主角。他们利用整理好的灾害史料,进行分析研究,积极探寻海洋灾害发生的总体规律。有关海洋灾害史的总体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古代海洋灾害概况的描述及规律性的总结上,如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科学出版社,1993年),其《分论》中有海洋灾害专项。高文学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地震出版社,1997年),在各朝代灾害概况的叙述中,有海洋灾害专述。张家诚等《中国气象洪涝海洋灾害》(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在论述当代海洋灾害时,对古代的海洋灾害也简要提及。

在海洋灾害史的专项研究中,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海潮灾害的研究,这也与前期潮灾史料的系统整理相关联。而潮灾按其爆发原因大致可分为海啸和风暴潮两类。

风暴潮研究。风暴潮灾是中国古代最严重的海洋灾害,因而也是学者着力最多的领域。风暴潮是指由强烈大气扰动如台风、热带气旋、温带气旋等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它是造成沿海潮灾的最常见原因。我国海岸带跨越几大气候带,是风暴潮灾多发的国家。

早期风暴潮研究的成果侧重于规律性的探讨及概况描述两方面。高建国《中国潮灾近五百年活动图像的研究》(《灾害学》1986年第2期)通过对潮灾史料的分析,总结了我国近五百年风暴潮发生的总体规律。陆人骥、宋正海《中国古代的海啸灾害》(《灾害学》1988年第3期)对中国古代的海啸灾害作了概括性的介绍,文中的海啸主要是指风暴海啸,即今天学界通用的风暴潮灾,总结了风暴潮危害性的七个方面:溺人、毁房、决海塘、沉舟船、卤死庄稼、没盐业、次生灾害;论述了古代人们对风暴潮海啸成灾及预报的认知。高建国《历史灾害资料在当前减灾工作中大有作为:以1862年珠江三角洲的风暴潮为例》(《灾害学》1992年第2期),通过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及理论测算指出,1862年7月27日珠江三角洲特大风暴潮潮位可能高达7.6—8.5米,远远超过应用15年观测资料外推的1000年一遇的2.86—5.11米潮位,证明历史灾害

资料在当前减灾工作中可发挥重大作用。

在风暴潮的地域研究上,郑锡煌《北方海域的历史风暴潮灾》(《自然地理与环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着重探讨了长江口以北海域历史时期的风暴潮灾,对北方海域风暴潮灾特点、发生规律进行了重点讨论。李平日等《珠江地区风暴潮沉积研究》(广东科技出版社,2002年),在“历史上风暴潮”一章列举了珠江地区历史上较大的风暴潮灾,探讨了风暴潮的发生规律及危害性。

在古代风暴潮的整体研究方面,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四章《海洋与自然灾害》分潮灾概况、滨海长城、海塘与潮闸、海洋风暴及其预报、海洋自然异常现象几个小节概述了中国古代的海洋灾害(特别是风暴潮灾)。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四编第十五章“风暴潮”,对中国古代的海洋灾害用100年及20年的频次表列出,探讨了风暴潮灾的分级标准、成因与规律,还重点讨论了重大潮灾的发生规律。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总结了中国古代对台风和风暴潮的综合预报经验。

海啸研究。现在海洋灾害学界通常所说的海啸,是指地震及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海啸是指海上风暴来临时大海发出的啸声,与学界现在通行的称谓有所差异。学者们在判定中国古代的海啸发生是以时下观念为准,即文献中出现“地震、海溢”的记录就断定为海啸或疑似海啸,根据一些海水异常状况如一日三潮等现象推论为海啸。中国古代海潮灾害的文字记录较为简略,这给海啸的判定带来很大困难,加之学界对中国海啸发生状况的看法不尽相同,所以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古代海啸判定的争论及资料的收集整理上。

李善邦《中国地震》(地震出版社,1981年)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地震海啸灾害,并收集了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十多次海啸灾害。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一书中专门设有“地震—海啸”年表,收录的例子较《中国地震》略多。

古代海啸的另一类研究是对海啸多发区域的探讨,如李灼华《苏沪浙沿海地区的海啸》(中国科协天地生综合研究联络组编《天地生综合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为在江浙沿海建核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概述了该区历史上潮灾发生的情况,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尤其关注地震海啸的发生情况。作者经过分析,部分否定了日本学者庆松光雄(1963年)的研究,庆松光雄认为历史上江浙沿海共发生过五次地震海啸。李灼华认为正德四年(1509年)六月发生于嘉定、宝山一带和康熙九年七月初五发生在苏州一带的海啸不能成立。

我国虽然是海啸少发的国度,但因为海啸的巨大危害性,所以相关的理论研究很多,其中也间或涉及古代海啸的事项。如杨华庭《海啸及太平洋海啸警报系统》(《海洋预报》1987年增刊“风暴潮及海啸”)论及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于今台湾高雄的大海啸,认为此次海啸共造成约5万人死亡,是中国最大的海啸灾害。

此处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在根据我们现在的“海洋灾害知识”去界定某一灾种时,必须谨慎从事。应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献的海洋灾害记录,分清历史场景及文献记录习惯,切不可断章取义,只取一面之辞。如被诸多学者认定的世界上最早的海啸记录:西汉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汉书·元帝纪》)及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台湾大海啸,在定论以前,均需比对文献,并结合当时沿海的社会经济状况,仔细斟酌。就“第一

次海啸记录”而言,首先应弄清楚的是“一年中地再动”与“北海水溢”是否是同一时空下的事件。文献将其记录在一起并不表示它们之间有因果关联,而据本人初步研究,认为判定此次海啸的证据严重不足(关于此问题,笔者已专文讨论)。

### 三、历史学本位的海洋灾害史研究

虽然有关海洋灾害的资料较为丰富,但长期以来,因为海洋观念的缺乏,海洋灾害史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没有海洋灾害专项研究,只在论及沿海水灾之时偶有涉及潮灾,如间渔《最近江苏各县清代水旱灾表》(《人文》第2卷第8期,1931年10月)、朱焕尧《江苏各县清代水旱灾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7卷,1934年11月)。20世纪90年代起,当灾害史的研究在历史学界迅速兴起,各类灾害史丛书及著作纷纷面世时(可参见李文海:《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序,中华书局,2000年),有关海洋灾害史的研究事项也引起学者的关注。综观历史学界的海洋灾害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漂风难船的海难研究。海难是各类海洋灾害因子给人们海洋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灾害性后果,主要表现为对海洋社会经济生产及生活工具——船舶的破坏及人员的伤亡上。海难的成因有多种,从海洋灾害的角度看,飓风、海雾、礁石、浅滩、海冰等均会引发海难。在帆船时代,飓风是引发海难的最常见原因,它引发的海难即文献中所称的漂风难船(当然很多时候是沉入海底变为沉船了)。

国内的海难史研究首先是从有关琉球的漂风难民问题起步的,大多在中外关系史的框架下,以琉球为中心讨论明清时期中琉之间的朝贡贸易及邦交关系。这是因为有关琉球的研究资料较为系统、完整。此外,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大陆、台湾、冲绳三地轮办)的定期召开及历代宝案、中琉关系档案等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少雄《清代中国对琉球遭风船只的抚恤制度及特点》(《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考察了清代中国对琉球遭风难船的抚恤制度。徐艺圃《乾隆年间白氏飘琉获救叙事述论》(《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详细叙述了《白氏问答》(与前述《白姓官话》为同一书)所记山东商人白世芸于乾隆十四(1749年)年从胶州沿海开船放洋,中途遇暴风,随风飘至琉球获救之经过。俞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贸易——兼论中琉互救漂风难船的活动》(《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论述了明清中琉互救漂风难船的情况,考察了难船所载货物及贸易量在中琉总贸易中所占比重。作者认为琉球借派遣护送中国难船之际所做的贸易额较大,是中琉贸易活动的重要补充形式,推动了中琉贸易发展。此类船只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从事贸易活动,一种是开展救国运动,向清政府请愿。杨桂丽《清代中琉之间的航海漂风难民问题》(《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三卷,海洋出版社,2002年)详尽论述了清代中琉之间的漂风难民问题及相互救援活动,并附有详细的清代中琉之间的漂风难船年表,是有关清代中琉之间漂风难民问题最为全面的研究。

有关清代台湾地方官府对琉球漂风难民的救助研究方面:张先清、谢必震《清代台湾与琉球关系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考察了清代琉球船遭风漂至台湾的情况。杨彦杰《台湾历史上的琉球难民遭风案》(《福建论坛》2001年第3期)收集了清朝因遭风漂往台

湾的 64 起琉球难民事件,并论述了台湾地方官府对琉球难民的救助和抚恤,揭示了清代处理涉外事件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南中国海的海难研究方面,孙宏年《清代中越海难互助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南洋问题研究》2001 年第 2 期)考察了清代中越海难互助事件,认为救助是人民之间的自发行为,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由于两国政府的介入,加强了两国之间宗藩关系及和平友好关系。

近来从海难及海事史的视角去探讨清代的漂风难民问题的有,徐恭生《清代海上漂风难民拯济制度的建立和演变》(《第八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那霸: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会,2001 年)主要探讨清代对漂风难民的救济制度及其演变过程。

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的研究。陈春声《“八二风灾”所见之民国初年潮汕侨乡——以樟林为例》(《潮学研究》第 6 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年)利用樟林赈灾委员会编的灾后纪实资料——《樟林风灾特刊》,描述了 1922 年 8 月 2 日(农历六月初十)台风风暴潮给潮汕地区沿海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以樟林为例,着重分析了灾后地方社会如何应灾、减灾、赈灾,揭示了各乡村社会内部各群体在救灾中发挥的不同功用(宗族、士绅、商人、华侨)。通过此次樟林的风灾,透视出侨乡的特色及华侨在灾后地方社会重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吴松弟《1166 年的温州大海啸和沿海平原的再开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以南宋乾道二年(1166 年)八月温州沿海大风海溢为中心,从灾后重建、移民的视角入手,着重论述此次海啸对温州沿海社会的影响及灾后移民重建的历史过程。吴文虽然主要关注灾后的移民过程及经济开发,但这种讨论重大海洋灾害后经济重建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鉴,历史时期重大的海洋灾害不胜枚举,如能将大灾与具体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进行微观的研究,应是深化当前海洋灾害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虽然吴晗先生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 年)中辑录有许多中国渔船及商船漂风到朝鲜半岛的事例,但长时期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日本学者较早关注中朝之间的漂风难船问题并将其运用到中国沿海的航海商贸研究中。国内学者许檀在有关清代沿海贸易及北方海洋经济的研究中,吸收了松浦章的漂风难船研究成果,制作了“山东沿海南北贸易商船示例”(许檀:《清代前中期的沿海贸易与山东半岛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清代前期东北沿海南北往来贸易商船示例”(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2002 年)两表,部分展现了清代北方沿海贸易的历史场景。此外,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也引用了相关难船资料来分析沿海贸易。

海洋史学的海洋灾害研究。在杨国桢先生倡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海洋灾害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近年他更是主张从中国海洋史学的视角与方法去考察中国海洋灾害的事项,即从多维的角度去审视海洋灾害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这主要反映在其主编的“海洋中国”及“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丛书中(前一套 8 本已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后二套

计划出12本,已出4本)。杨国桢《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之经济篇,从各类文献中收集了清代80余条闽地商贾在黄渤海地区的漂风难船案例,从侧面展现了清代福建海商在北洋地区的商贸概况,有助于重新认识清代福建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圈的全貌和中国南北海洋经济交流的运作。杨国桢《东溟水土》(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东海台风巨浪与帆船海难”一节,综合利用各类史料及海内外的研究成果,详细考察了历史时期东海海域发生的帆船海难及其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指出因为海难的时常发生而使得海洋渔业经济、海洋航海贸易经济的风险和机会成本具有不确定性,这一方面造就了海上社会群体的悲情意识,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他们冒险进取的海洋精神。在“海岸带农业”一章,将海洋灾害作为海洋环境的重要因子,讨论了海洋灾害对海岸带农业的影响。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收集了环中国海海域大量沉船的实例,通过对海洋沉船的海洋社会经济分析,揭示了沉船背后的中国海帆船技术、航路网络及船货经济等海洋社会经济内涵。王荣国《海洋神灵》(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也从海洋神灵信仰的视角,审视了海洋灾害的影响。

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相关研究。1960年,曹永和对清代台湾的水灾与风灾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虽然他没有以海洋灾害分类,但详尽胪列了有清一代台湾地区的风灾及水灾情况,并分为灾害成因、灾害损失、灾害之影响、救灾政策与善后重建四大部分,详细论述了清代台湾的风灾与水灾概况,分析了灾害成因的自然及社会因素、灾害对台湾社会影响,讨论了官府及民间的灾害救助和应对(曹永和,《清代台湾之水灾与风灾》,原载《台湾银行季刊》第11卷第2期,1960年6月;后收入《早期台湾历史研究》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台湾地区学者有关海洋灾害的研究集中于海难史的研究方面。有关海难的早期研究,也是以琉球为中心,在中琉关系的视角下讨论漂风难民问题。如吴幅员《清代台湾所遇琉球遭风难民事件》(《东方杂志》复刊第13卷,第9、10期,1980年3、4月)、徐玉虎《清乾隆朝琉球难夷风漂至台湾案件之辑释》(《台北文献》直字号,第61、62期,1983年3月)等。徐玉虎《历代宝案所见清宣宗朝琉球对中朝海难事件之处理》(《第二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那霸: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89年)根据历代宝案,考察了清道光朝琉球对中朝海难事件的处理情况。

近年来,以汤熙勇、刘序枫及日本学者松浦章共同主持的海难研究计划最为引人注目。其初期成果体现在《近世环中国海的海难资料集成:以中国、日本、朝鲜、琉球为中心》(中研院中山人文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中,它搜集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及琉球各地影印出版或未刊的抄本等共70余种,按地区分为四大类:中国史料、朝鲜史料、琉球史料、日本史料,各史料再依其内容分册(详见汤熙勇《近世环中国海的海难资料集介绍》,《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1期,2000年2月)。在此资料的基础上,他们也展开了海难救助的专项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汤熙勇《明代中国救助外国籍难船及漂流民的方法》(第九届明史国际研讨会论文)论述了明朝救助外籍难船的态度、漂流到中国之外国籍难船的数量、外籍漂流民的调查、外籍漂流民的照顾、外籍漂流民的遣返等问题;《清代台湾的外籍船难与救助》(《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中研院中山人文科学研究所,1999年)、《清顺治至乾隆时期中国救助朝鲜海难船及漂流民的方法》(《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辑,中研院中山人文科学研究所,2002年)则分别考察了清代台湾对外籍难船的救助及清顺治至乾隆朝对朝鲜难船的救助办法。刘

序枫《清代中国对外国遭风难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鲜、琉球、日本难民为例》(《第八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冲绳: 琉中关系国际学术会议, 2001 年)、《试论清朝对日本海难难民的救助与遣返制度之形成》(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论考》, 中华书局, 2001 年)、《清代环中国海域的海难事件研究——以清日两国间对难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为中心(1644—1861)》(《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辑), 主要考察了清代中、日、朝之间对海难难民的救助与遣返制度。

在当前海洋史料多为“碎片”的情况下, 海难史资料的充分发掘与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汤熙勇等人的海难研究计划, 不仅为环中国海的海洋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而且他们有关中、日、朝之间海难救助制度的研究, 也深化了原来以事件为中心的海难史研究模式, 为探讨亚太地区各国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素材, 这也是今后海难史深层次与多样性研究有待充分发掘的领域。同时, 海洋灾害研究与海难史的研究有相互交叉的领域, 借助海难史的相关资料及研究成果, 也可深化海洋灾害史及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日本学者有关明清漂风难船的研究多属实证性质, 大部分以日本为中心, 多从国际关系及海难救援的角度进行论述。赤岭诚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冲绳时报社, 1988 年)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研究, 其附表收录了 1390—1876 约五百年间, 中琉航路上的海难事件 645 起。此外, 在历届中琉关系史国际会议中, 日本也有许多学者提交了有关琉球海难的相关研究论文。如岛尻克美《近世中国船只漂至琉球的处理规定》(《第二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新城敏南《关于近代八重山的海难事件》(《第四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那霸: 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 1993 年), 黑木国泰《从漂流、漂著船史料看十七、十八世纪环中国海地区组织体系和锁国体系》, 小林茂、松原孝俊、六反田丰《朝鲜—琉球、琉球—朝鲜船难年表》, 六反田丰《从“济州启录”看十九世纪济州岛民之海难与漂流》(《第七回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台北: 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 1999 年), 池宫正治《海难与大鱼的救援故事——以“球阳”为例》、丰见山和行《近世琉球之漂流、漂著问题——从难民救助及漂著日本的情况谈起》、上江洲安亭《清代台湾的琉球漂流民遭难事件——以乾隆五十五年及嘉庆十五年的事例为例》、田名真之《琉球船的漂流、漂著——以乾隆期的事件为例》(《第八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值得注意的是, 西里喜行《关于清光绪年间的“琉球国难民”漂流事件——以救国运动为中心》(《第二届琉球·中国关系史研讨会论文集》)一文, 介绍了救助、送还琉球难民的组织, 并考察了清代琉球难民的贸易活动及其有关情况。认为漂流难民有两种类型, 一为因气候的变化而遭遇不测的遭风难民; 一为乔装漂流的“伪装难民”。光绪五年(1879)日本废琉置县后, “伪装漂流船”速增。此处西氏注意到了因政治动机而出现的“伪装漂流船”现象。其实出于对外贸易诉求的“伪装漂流船”现象在禁海时期及对外贸易限制地区也屡见不鲜, 值得引起重视。

日本学界对环中国海海难研究特别是中朝之间的海难研究之集大成者当属松浦章先生。他早在 80 年代初期便关注到了中朝之间的漂风难船事件, 并将其应用于中国沿海的航海及商贸研究。重要的成果有:《李朝时代における漂著中国船の一资料》(《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 15 辑, 1982 年)、《清代における沿海貿易について》(小野和子主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3 年)、《李朝漂著中国船の問情別単について》(《关

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7辑,1984年;第18辑,1985年)、《清代における山东・盛京間の海上交通について》(《东方学》第70辑,1985年)、《乾隆十四年中国商船漂流琉球小考》(《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国帆船的航海记录》(《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32辑,1999年)。

松浦章先生在中国大陆刊物上发表的相关中文成果有:《漂流到琉球的江南商船:以〈百姓官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11期)介绍了《百姓官话》一书的来由,并将之与历代宝案相校,考证了其中漂风日期的错误;《明代朝鲜船漂到中国之事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根据崔溥的《漂海录》等相关史料,研究了明代漂流至中国之朝鲜人、船舶等事例,还介绍了朝鲜沿海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在出海之际如何备粮及其遣返情况;《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则结合海难资料及稀见史料,介绍了明末中日间的海外贸易概况,重点探讨了中国福建、浙江商人的航海贸易。

#### 四、不足之处与前景展望

以上,笔者试以中国海洋史学的立场,简要回顾、审视了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的成果。就海洋灾害史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盲点及薄弱环节,许多研究领域亟待加强。

(一)海洋灾害史料的整理还不够系统和完善。海洋灾害史料的整理为海洋灾害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当前的海洋灾害史料多集中于潮灾方面,海洋灾害其他方面的史料没能充分发掘,这也影响了对此类灾项的深入研究。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史料整理中太强的目的性,导致了强拉硬扯之弊,有的还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再者,有时为了贪多求全,也忽略了对史料的必要考证,使得史料本身的严谨性大打折扣。而许多研究者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各式分析和建构的各种模型的科学性也随之受影响。

(二)海洋灾害的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有待提高。历史学界有关海洋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其它海洋灾害的专项研究只有零星涉及。目前,如海难、沉船这类深入的海洋灾害专项研究还比较缺乏,除了自然科学工作者探讨较多的风暴潮、海啸外,历史时期沿海风沙、海岸侵蚀、海冰、海雾等海洋灾项的研究相对较少或几乎空白。今后应大力加强中国海洋灾害史的专项研究及个案研究。

在海洋灾害史的总体研究方面,除了自然科学者对灾害规律性及危害性的探讨外,目前尚无从历史学的本位出发的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成果。还应从海洋史学的视角,去深入讨论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考察国家与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审视海洋灾害对海洋文化、海洋民俗的影响,总结海洋社会减灾、防灾的历史经验。

(三)应加强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海洋灾害史作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相互交流合作,形成集体的合力,才能将其做大做强。在研究方法上,应进行“科际整合”,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和特性相结合,各取所长。自然科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是寻求长时段连续性的数据,来推演海洋灾害的发生规律,为现实的海洋防灾、减灾服务。他们擅长的与当代灾害研究接轨的意识及数据处理方法值得研究海洋灾害史的人

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借鉴和学习。但有时太强的目的性也妨碍了他们对史料的整体把握,往往会失之片面,有削足适履之弊。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在研究海洋灾害史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许多海洋灾害史的研究近似于灾害史料的编纂,故当各类海洋灾害史料整理完毕后,有的研究者便觉得“无处下手”了。加之有些关键史料的缺乏,就很难彰显灾害背后宏阔的历史场景,使得研究成果多停留在表象描述的层次上。所以在海洋灾害史总体研究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不同学科之间的优势,整合各自的研究方法,寻求新的突破点,就显得尤为迫切。

## 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8月21日“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8月24日,会议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了最后的大会发言和闭幕式。这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共同主办。会议有三个主要议题:元代社会史、文化史、元世祖忽必烈研究。以下按专题作一综述。

### 一、元代社会史研究

族群关系。元代中国呈现出多族群、多文化的社会面貌,萧启庆(台湾清华大学)《元代多族土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土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土人的文化互动。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华北汉族精英层的延续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台湾清华大学)统计分析了镇江路官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治理江南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从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从元朝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等方面讨论了处于国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许守泯(台湾成功大学)从土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郑氏家族的经营发展作了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土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指出元代江西抚州地方政府中大量官员出自平民的现象可以从元代官制和抚州的区域特征来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赵华富(安徽大学)对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元代契尾的标题、年代、文字作了考辨(《〈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